

保羅·蒂埃里·埃維·蘇萊曼



刘健安

湘赣蘇維埃主席譚余保

王震

右图

1938年谭余保
在延安



下图

解放初，谭余
保在群众之中，
中立吸烟者为谭
余保





上图 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坏的谭余保老家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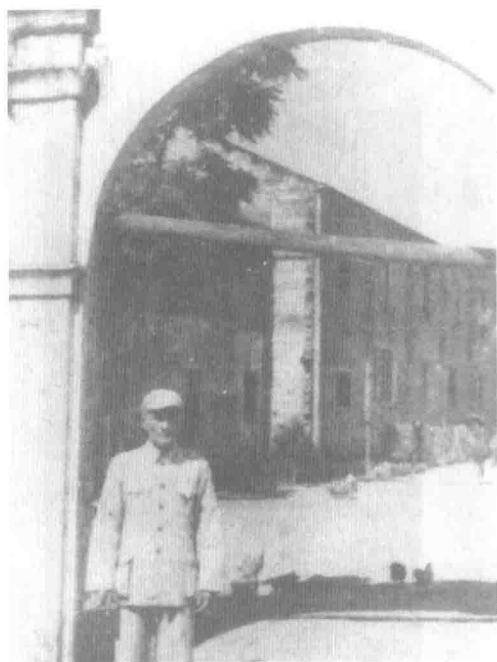
下图 被白军毁坏的茨坪红军谷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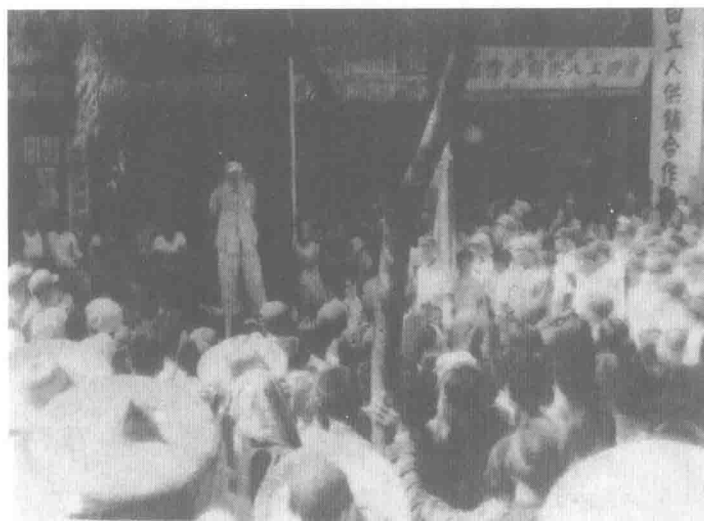
上图

湘赣苏维埃省政府
谭余保办公的处所



上图

1931-1934年湘赣省苏
维埃政府(设于永新城内)
的大门



左图

谭余保在群
众集会上演讲



左图

苏维埃时期，红军
驻扎上陇乡的营房。图
为尚存的一间房子

下图

苏维埃县政府机关
的全景





左图

宝塔山下，谭余保
跟着毛泽东主席

下图

1950年，谭余保陪
同越南胡志明主席接见
演员





左图

耐心说服谭余保
下山、险被误杀的陈
毅同志

下图

50年代陪同朱德
视察株洲的情景





上图 谭余保与王震一家在延安的合影

下图 战友相会，从左至右为：李贞、甘泗淇、易湘苏、谭余保、张启龙、易纪均、王首道





左图

谭余保与叶剑
英在延安合影

下图

王震、谭余保50年
代一起视察洞庭湖



下图

谭余保与甘泗淇、
张启龙在延安合影



并非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

——《湘赣苏维埃主席谭余保》一书代序

王 震

我想写篇文章，纪念井冈山的老战士、老赤卫队员谭余保同志，这并非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我想，他为革命献身的无私精神，特别是当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那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对于今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仍然是十分宝贵的。

谭余保是任弼时同志在湘赣工作时很敬重的一个同志。他的名字在井冈山很响亮，一直到现在他家乡还有许多关于他当年闹革命的传说。陈老总说他是一个农民革命家、农民领袖。我同谭余保同志在一起工作过，对他比较熟悉。他是湖南茶陵人，家贫失学，从幼年起就与父母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田里耕耘操劳，在山里砍樵采摘，春去秋来，终年劳碌，可是到头来除送租外，所剩无几，难以温饱，再加上官府抽税，豪绅勒索，弄得他家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就是在这种劳累困扰中长大成人的。他勤劳朴实，刚勇正直，精通各种农活。为了反抗土豪劣绅官僚衙役的欺凌压迫，他和许世友同志一样苦练了一身好武术。许世友练的是北路少林拳，他练的是南路武当拳。对于他的拳术我领教过，三、五个人难以

近身。凭着他的不畏强暴、见义勇为和好打不平，他集结了乡里有血性的穷人子弟组织了“招公会”，平素合伙练功习武，遇事则集众主持公道，抗捐反霸。因此，早在参加革命前，他就被当地的地主豪绅视为聚众闹事的“罪魁祸首”。1926年，北伐军占领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谭余保同志积极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打土豪，抗租税，建立农会政权，支持北伐战争。1927年初，经过痛苦的寻求探索，谭余保同志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光明的前途，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从此走上了自觉的革命道路。

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追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农会会员，在白色恐怖下，谭余保毫不动摇，坚持在农村斗争。他昼伏夜行，联络党员，组织群众，为党保存了革命的火种。8月，毛主席在湘鄂赣广大地区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先是由湘东到江西，又折回湖南，11月打开茶陵县，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谭余保同志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不久，红军主动撤出茶陵转移到井冈山开辟根据地，谭余保同志根据党的需要留在茶陵坚持游击斗争。这期间，他帮助谭思聪、谭家述等同志在九陇山建立了茶陵第一支地方武装。1929年夏，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谭余保同志领导家乡的农民暴动，砸了地主武装“挨户团”，缴获了十几支枪，使茶陵县群众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1930年，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领导的主力红军的胜利鼓舞下，湘赣边区各县红色政权大发展，谭余保同志担任了茶陵县苏维埃主席。就在这时，我和张启

龙同志带领萍（乡）、浏（阳）、醴（陵）等地游击队组成的湘东南独立师奉命到湘东活动，经谭思聪同志的介绍与他认识。1931年9月，中共湘东南与赣西南特委的革命政权合并，分别成立了湘赣省委和省工农兵政府。谭余保同志先是任省财政部长，后又任省苏维埃副主席、主席。

谭余保同志对敌斗争勇敢坚定，对同志坦率真诚，对工作认真负责。他是在革命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湘赣地区土生土长的群众领袖，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信。可是，他从来不搞自己的山头。他对中央派来的同志都是热情支持的。他很尊重和拥护任弼时同志的领导，帮助王首道、肖克、蔡会文、张子意、袁任远、甘泗淇、李达等同志工作。他民主作风强，虽然性情急躁容易激动，但他很能联系群众，团结同志。

谭余保同志长期主持湘赣边区的地方工作，可是他少有狭隘的地方主义。他能顾全大局，竭尽全力支持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1931年夏，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红七军由广西转战广东、湖南、江西，经湘赣边区去中央苏区时，谭余保同志积极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帮助部队解决住宿补给困难，动员边区青年参军，这些都给红七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加强了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

谭余保同志虽然是农民出身，但反对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错误主张。他认为富农、地主也可分给田地让他们自食其力，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阶级路线。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土地政策，那时在党内是有人反对这个政策的。另外，谭余保同志还凭着他深厚的革命感情，冒着风险，在王明的“左”倾路线下保护了

一些干部和群众，虽然他自己也受过不少挫折，走过不少弯路。正是由于受过挫折，走过弯路，他才更加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33年11月，我和谭余保同志一起去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是湘赣省代表团团长。大会结束后，我们留在中央苏区参观学习。第二年一月底，就在我们回去前，毛泽东同志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听了瞿秋白同志的“二七”纪念日报告再走。毛主席很看重瞿秋白同志，对我们讲秋白同志是个很有影响、很有能力的老党员，是我们党内有名的领导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专门对我们指示湘赣边区红军要巩固和发展，一定要采取游击运动战。我们回去是按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做的，结果打了大胜仗。那时，毛泽东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军队，威信都很高，谁也没有去大树特树这种威信，可是，它却在群众的斗争中自然而然形成了。谭余保同志很热爱毛主席，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

1934年秋，红六军团在任弼时同志的率领下突围，前去与湘鄂西贺龙同志的红二军团会合，开始了长征。谭余保同志被留下来坚持斗争。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把最好的干部、粮食、弹药都支援了向外突围的主力红军。主力红军走后，斗争环境更加恶劣，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清剿”等等手段进行灭绝人性的残酷扫荡。谭余保同志和战友们风餐露宿，化整为零，以无比顽强的毅力，依靠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同敌人展开了灵活的游击战争。由于经受不住这种严重的考验，革命队伍内

部不断有人动摇逃跑，叛变投敌。可是，谭余保同志从没悲观失望过，他坚信革命的红旗一定会打下去，他一方面用自己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来教育和鼓舞身边的干部战士，积极寻求战机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又同以原省委书记陈洪时为代表的党内右倾逃跑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和其它同志一起抵制了陈洪时提出的将省委机关搬到城市、脱离部队的主张，使得陈洪时企图分裂省委、退却逃跑的阴谋没能得逞。1935年6月，陈洪时利用谭余保等同志去与在湖南坚持斗争的蔡会文同志联系的机会，无耻叛变投敌。对于陈洪时的投机革命，谭余保同志察觉得要比我们早。长征途中，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痛地对肖克、张子意、袁任远等同志和我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下，我们没有听他的意见……”

陈洪时的叛变，更增加了斗争的困难。由于他是湘赣省的主要负责人，反动派大肆进行欺骗宣传，企图分裂红军，瓦解红军的斗志。在这革命垂危、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谭余保同志挺身而出，力挽危机。他闻讯后，立即冒着危险，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赶回湘赣，召集分散在各地仍在坚持斗争的同志，在莲花棋盘山召开湘赣省紧急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革命处于低潮时，像陈洪时这样投机革命的人动摇投降是毫不足怪的。他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坚定信心，为党的事业战斗到底。同时，又发表了告群众书，指出红军主力出去是为了开展新的地区，共产党人是任何反动势力消灭不了的。这次会议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肃清了由于陈洪时的叛变给党内带来的思

想混乱，提高了群众斗争到底的信心。这次会议之后，在谭余保同志主持下改组了省委，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新的安排。这些措施对于以后巩固和发展湘赣地区的游击斗争起了决定作用。

湘赣地区的游击战争，在谭余保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一直坚持到1937年底陈毅同志去联系，才按党的指示出山抗日。有个《陈毅出山》的话剧，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舞台上韩山河形象的生活原型就是谭余保同志。由于长年累月被敌人围困在山里，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又早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谭余保同志除了偶尔从缴获的敌人报纸上了解一些情况外，实际上对全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一无所知。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前去要他出山，他不相信。谭余保同志本来对陈老总是非常敬重、非常热爱的，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轻信。他对敌人的劝降和利用叛徒设下圈套把游击队骗下山去消灭的卑鄙手段持有高度的警惕。当时，经过陈毅同志耐心反复地向他传达和解释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个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在那样闭塞的情况下，经过斗争和深刻的思考，终于很快地接受了党中央的路线。

可是，谁能想到谭余保这样一个刚强的汉子，事后，竟把自己整整在屋里关了一天。他恼恨自己的鲁莽，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实际上，他什么错也没有，面对的是残酷的流血斗争，稍有疏忽，就要人头落地。他怎能不慎重？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那时，我们党内的作风就是这样，大家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文过

饰非的现象是很少的。后来，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这件事，夸奖谭余保同志办事粗中有细。毛主席在这里讲的“细”字，不仅是有细心的意思，主要还是讲谭余保同志在政治上很强，能够较快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改变。

三年游击战争是非常艰苦的，谭余保同志又得了严重的肺病，不能到新四军抗日前线去，他依依不舍地把自己领导多年的部队交给了其他的同志，按照党的决定去延安学习和休养。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谭余保同志向大会汇报了如何在湘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到会代表无不为之感动。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主力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在远离党中央、不知道遵义会议精神的情况下，谭余保等同志能够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对王明“左”倾路线留下的一些政策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使它有利于发动群众和保护自己。

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谭余保他们不知经过多少挫折，吃过多少苦头，流过多少血，才从实践中认识到必须调整这些政策。他们当时和我们今天一样也面临着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也许，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高度。而对那些错误政策的调整也是在被动中进行的，不能不调整。那些政策越来越使自己孤立。即使是这样，难道他们就不值得我们钦佩吗？

谭余保是一个平凡的人，可是有着一颗赤诚的心。他出身于农民，一生保持着农民的勤劳、朴实、正直，可是在党的教育下，他克服了小生产的狭隘、自私、保守。他是湘赣地区农民运动的领袖之一，是坚持湘赣三年游击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可是他从来不居功骄傲，从不计较